

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演变中的身体线索

胡科^{1,2}, 黄玉珍¹, 虞重干²

(1.长沙理工大学 体育部, 湖南 长沙 410076; 2.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 200438)

摘要: 学校是实施身体教化的主要场所, 学校体育则是实施身体教化的重要手段, 学校体育思想内在蕴涵了社会对于身体的教化预期; 伴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 学校体育层面的身体, 经历了军国民体育的国家化动员、自然主义体育的生活化回归、民族主义体育的民族化印记、技术教学体育的生产化取向、体质教育体育的物质化痕迹、健康教育体育的权利化突显等历程。无疑, 学校体育思想的演变历程, 蕴涵了深刻的身体内涵变迁景象, 透过身体变迁景象表达的正是社会变迁的丰富图景。

关键词: 体育思想; 学校体育; 身体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0)09-0008-05

Bodily clues in the evolution of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ideology in China since the modern time

HU Ke^{1,2}, HUANG Yu-zhen¹, YU Zhong-gan²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6, China;

2.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School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implementing bodily education, while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implementing bodily education. The intrinsic connotations of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ideology contain the expect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bodily education. With the transition of the society in China since the modern time, the body in terms of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such courses of transmutation as the nationwide mobiliz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sports, the return of naturalistic sports to living sports, nationalized designation of nationalistic sports, the productized orientation of technical teaching sports, the materialized trace of sports in fitness education, and the right oriented highlighting of sports in health education. Undoubtedly, the course of evolution of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contains profound images of bodily connotation transition; what is expressed through images of bodily transition is exactly an exuberant prospect of social transition.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ideology;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body

身体既非单纯的生物体, 也非简单的社会建构物, 身体的生成过程必然是基于自然身体之上, 是国家意志、社会结构、自我实践综合作用的产物。作为社会教化的重要手段——学校体育, 必然会在其价值主旨的凝结——学校体育思想中, 内在蕴含国家、社会对于个体的教化预期; 而国家、社会对于社会个体的教化预期, 必然通过丰富多彩的身体图景予以展现与实现。纵观一段历史时期的学校体育思想的演变历程, 可以从中勾勒出独特的身体变迁景象, 透过身体变迁

的景象可以表达社会变迁的丰富图景。本文将以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演变进程为蓝本, 以身体为线索, 来勾连学校体育思想、身体、社会这三者的关系。

之所以选择“近代以来”这一特定时期, 是基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历经了亘古未有之大变, 无论是国家形态、社会结构, 还是人们的思想意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一国家、社会急剧转型的宏大背景下, 学校体育思想变化各异、精彩纷呈, 可为研究提供极其丰富的素材。

1 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演变历程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虽未开发出一套类似于当前现代式的身体教育文化，但在久远的历史传承中，对于身体保全这一重要议题从未缺少过关怀，无论是先秦的儒家、道家思想，还是在后来被世人诟病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中，都广泛的存在生命关怀方面的主题。与西方体育文化所不同的是，在儒家文化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育体有着别样的逻辑，即育体始终与道德诉求关联。依据中国儒家经典的阐释，天人之和在于“敬德保命”、“修德配命”^[1]，命在于天，得在于人，通过道德修养，可以实现颐养天年。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在“德润身”的教化中保养、延续生命。因而，在学校的常规教育中，修身、养性始终相连，人伦教育被视为根本，外向型的身体教育只可能出现在非主流的武备培训机构之中。内向化的生命保全方式，以其独特的心理调试手段实现了人的身心、身物和谐，在治世之中，尤其彰显价值。然而，适逢乱世，道德育人、修德保命的生命保全方式在武斗中完全失去了价值，道德修养可以使人心灵平静，可以修身养性，但不利于身体强健。羸弱的身体在战争中往往只能沦为祭品。

近代中国，由治转乱。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将晚清的士大夫从天朝大国的睡梦中轰醒，蓦然回首，国家已是千疮百孔，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颓势使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无比落魄，不堪一击。如何扭转颓势，重振中华？时代的压力使身体改造问题突显，“军国民体育”乘“西学东渐”之风进入中国。开明之士希冀通过援引德、日等国的成功经验来强国强种、尚武图存。一时间，尚武之风盛行于学校，学校一度成为尚武救国的教化场所。直到1919年，德国战败，并于凡尔赛会议中受尽屈辱，遭受英法等国报复性的对待时，以及战后兴起的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逐渐取代军国民主义，成为新一波的思想主流时，军国民教育才开始丧失其在中国的优势地位^[2]。

取军国民体育而代之的是自然主义体育思想。这种肇始于西洋的教育思想，经由基督青年会以及留洋回国学者的倡导而广为传播，自然主义体育主张去除体育的工具化，将体育的功能拉回到育人的本位上来。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自然主义体育的倡导，并没能也不可能解决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在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之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对于一味洋化的自然主义体育，当然容易激发民众的质疑，于是有学者从弘扬民族文化的角度，主张对盛行的自然主义体育改弦更张，替之以传统体育项目，一时间，在国内激起“土洋之争”大讨论。

新中国的成立成为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两极化的世界大背景下，在百废待兴的紧迫形势下，模仿苏联成为了必然的选择，此时，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社会管理、教育体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较为浓厚的“苏化”色彩。体育领域，不仅模仿苏联成立了我国的体育行政管理架构，还以苏联体育理论为蓝本，构建起我国的体育理论体系。学校体育领域出现的技术教学思想，即是以苏联的体育理论为依据提出的，此思想强调体育教学应当以掌握运动技术、技能为主，通过技术教学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建设国家的需要，使得举国上下对于身体给予特别关注。后来随着中、苏蜜月期的结束，国内曾有过短暂的将苏联体育本土化的思考，但连年的政治斗争使得这一主张收效甚微。而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社会已是一片混乱，学校体育的发展亦只能处于止步、停顿状态。文革时期，“军训”成为体育课的主要内容，劳动课一度替代体育课^[3]。

学校体育的完全复苏，已是文革之后，反思文革掀起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这轮思想解放对于学校体育的发展意义深远。旧有的一元式的学校体育思维被逐渐打破，话语的解放使得各种体育思想能够迅速出现，彼此交锋，学校体育迅速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针对学校体育过于重视技能教育、过度竞技化、学生体质下降的既有现实，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学者提出了体质教育思想，主张针对身体进行教育，以运动处方的形式强化学生的身体。与体质教育思想针锋相对的则是全面教育的体育思想，这一思想以体育功能的多元化为依据，认为学校体育除了增强体质之外，还应当具有心理、社会的功能，主张社会、心理、生物三位一体的“三维的体育观”^[4]。除了体质教育思想、全面教育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学校体育领域还曾涌现快乐体育思想、终身体育思想等，各种思想的交锋与争鸣对于学校体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学校体育理论。进入21世纪，在新的健康理念的主导下，学校领域树立起“健康第一”^[5]的学校体育思想，冀以此来重塑新世纪的学校体育。

2 学校体育思想演变中的身体解读

任何社会个体都将经历社会化的过程。通过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个体内化社会文化、学习角色知识，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与人格，在不断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实现由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无疑，在个体由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中，存着许多教化场所，诸如学校、家庭、社区等；而对于社会个体的教化也

会以多种途径实现,诸如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显然,与社会教化有关的所有场所中,学校必然是最为重要的场所之一;而学校体育又是学校实施社会教化至关重要的手段之一。学校体育思想以一定的身体理解作为其思想立论的依据与基础,通过身体教育的形式实现社会对个体的教化预期。考察各种类型的学校体育思想,可以从中解读出其内在的身体理念;而考察特定历史时段的学校体育思想的演变历程,可以从中发现身体独特的演变线索。

2.1 军国民体育思想中的身体:国家化的动员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把中国从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中解救出来构成了时代的主要使命,作为国家组成的每一社会个体,自然要在这一社会使命下分担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然而,数千年封建传统意识所形成的“国家、社会精英、民众”^[6]三分的社会结构,由于晚清以后,商品经济的出现、科举制度废除等对地方精英造成的致命打击,使得士绅等社会精英在地方整合中失去原有动力,由此导致中国社会在应对危机中出现了严重的整合危机。如何有效应对危机?必然需要在同一时间内开民智、强民力、加强对基层民众的整合。蔡锷、蒋百里、杨度、蔡元培等人引入军国民体育思想,其根本在于通过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等作为学校体育的主要内容,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以及培养军人精神,达到健身卫国的目的。一方面,希冀通过军国民体育强化国民身体,通过对国民身体的强化改造,使之迅速由一普通意义的身体转变为国家备战中的武备身体。身体角色的转换,其意义深远,不但意味着通过军国民体育教育使身体获得应对战争的基本能力,成为战备中的合格者,而且通过武备改造,对身体实现了迅速的国家化动员,社会个体随时听候国家的召唤,准备承担战争的使命;另一方面,通过军国民体育的贯彻实施,将救亡图存、保家卫国、挽救民众危难等思想,深入渗透到学生的深层意识之中,以高度的民族危亡来激起民众的社会认同,从而实现了对基层民众的深度整合。一般而言,身体既是个体的,也是国家所有的,但当国家面临灾难,身体的国有属性会覆盖身体自有部分的属性。将身体国有化,表达了在特定的时代之下,身体国家使命的强化。

2.2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中的身体:生活化的回归

军国民体育的广泛倡导与施行,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虽然通过对身体的武备训练,迅速实现了身体的国有化,使得身体的角色转变为国家武备的重要组成,但国家存亡危机并未化解。反而让人们看到了军国民体育机械、呆板,高度工具化的一面,军国民体育之

下的身体本性遭到了极大的扭曲。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教师资源的短缺,一时间,“大量的无知识、无道德的士兵一跃成为学校教师。这些人酗酒赌博、粗痞斗狠,使得学校名誉受到极大损失,社会普遍仇视体操一科”^[7]。而德国的战败,和平主义的崛起,更使得社会民众对这一起源于德国的军国民体育予以唾弃。正当舍弃军国民体育之时,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传入中国,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推崇者们反对宗教神权对人权的侵犯,提倡人性解放,主张身体教育生活化,主张身体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自然发展秩序,强调人身体的自然本性和价值。以自然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自由主义体育教育思想强调体育的育人目的,强调“体育必须和生活打成一片,使体育成为生活的实践”,推崇自然活动的手段,主张应尽量采用符合儿童本性的游戏、舞蹈、竞技运动和野外活动等作为体育的手段^[8]。自然主义体育理念下的身体已然去除了厚重的工具化味道,对于自然生活的崇尚与模仿,对于儿童自然本性的尊重,使身体的本质逐渐回归到生活中来。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尽管军国民体育已然失势,但并不表示此时的国家危机已经得到解决。国家危机依然存在,不过此时,人们不再那么非理性、功利化地将国家存亡全部寄托给身体武备,认识到救亡图存并非以武装的身体可以实现的,挽救国难应当建立在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上。对于身体教化即刻调整为依据身体之自然本性,予以引导、教化,使之实现全面发展。

2.3 民族主义体育^[9]思想中的身体:民族化的印记

如果从生物体的角度看待身体,身体定然是无国界、无民族的。然而身体之所以为身体,不被称为“躯体”,就在于身体不仅是生物性的躯体,还是社会性的身体。作为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体——身体必然内在的打上民族、国别的烙印。任一身体,自诞生伊始,便不可自决地标上了社会的属性。因而,身体经常成为民族之间、权力之间争夺的战场,诸如清初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作为身体教化的手段而言,本只需讨论其功效,无需讨论其民族、国别的。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但身体本身,就连身体教化的手段都会沦为斗争的对象。自然主义体育的引入曾对军国民体育起到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军国民体育,还是自然主义体育均是西洋的舶来物。这对于民族危难中的中国人而言,均是敏感的刺激因素。尽管“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效法西洋技艺的过程中能够短暂地将民族情绪予以抑制,但只要有刺激性的要素介入,这一民族情绪就会被随时激起。日本全面入侵中国,无疑成了民族主义体育重新活跃的外在因素。此时,身体的民族性、身体技术的国别会被人为放大,以此来

挑起争斗。而后的事实证明，身体虽有民族、国界的分野，身体技术却是没有必要强调其国界的。优秀的文化属于某一民族，也属于全世界的人民。民族体育曾与洋体育争论一时，最终也没有能够在学校领域全面贯彻，学校体育仍然是“土洋结合”的。

2.4 技术教学体育思想中的身体：生产化的取向

身体不仅是世界的知觉者，还是世界的生产者。在社会主义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虽然没有直接讨论身体理论的篇章，但在其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非人性化批判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生产性身体所遭受的厄运有过间接性的关注。社会主义体系建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放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身体，重新构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身体。而后发展的苏联体育理论，是以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为支撑的，强调体育的工具性与阶级性；强调体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手段；强调体育以“劳动卫国”为目的，以促进学生生长发育、增强体质为目的；强调在学习体育的基本知识、技术、技能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强调教材内容以竞技运动技术为主^[9]。建国伊始，在模仿苏联体育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的体育体系。此时，体育的工具性价值在百废待兴的社会大背景下显得弥足珍贵，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国家基础上建立起强盛、富裕的新中国，势必需要新中国的教育体系迅速培养出一批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来。在这一时期政府各部门所下达的教育、体育方面的方针、指示中，类似于“促进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为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保卫祖国做好准备”^[10]的表述具有极高的呈现频率。此阶段，身体教化的首要任务是建设祖国，身体承担了生产者、建设者的使命；所谓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当然指向祖国的建设者。

2.5 体质教育体育思想中的身体：物质化的痕迹

过分强调体育的工具价值，定然使得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异化。照搬苏联体育模式建立起的社会主义体育体系，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曾经有过分强调体育的工具性、阶级性的发展阶段。对于体育教学中以运动技能为主，能否有效促进身体发展、实现体质的增强，一些学者表示出质疑。文革后期，在学生体质呈现普遍下降的既有事实支撑下，有学者提出了增强体质的“真义体育”^[11]思想。体质教育以主客二元的身体思想为前提，主张依据现代理性化的科学手段对身体实施教育，注重身体锻炼的生物性效果、注重运动负荷的安排。体质教育思想的提出对于身体教育科学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所主张的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对身体实施“运动处方”式的健康干预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增强体质的作用。然而，这种建立在身

心二元思想基础之上的体育理论，使得身体带有浓厚的物质化痕迹。虽然“真义体育”倡导者也曾强调身体教育过程中的心理要素，但将身体客体化，然后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对物质身体实施科学改造，能否在客观上实现身、心的协调发展着实让人质疑。

2.6 健康教育体育思想中的身体：权利化的突显

当前社会已经进入到全面权利化的时代，各种公民权利充斥于世。曾经工具化的身体在权利时代的背景下，逐渐回归其本质含义，身体已然作为权利的代表与体现。身体作为存在者，首先当具有其最基本的权利——存在者的权利，这一权利以人权的名称赋予了身体，在此处，人的类本质是存在着的身体，身体与人是一体的；在存在者权利获得确保之后，才会有与身体生成与延展相关的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健康这一概念的内涵逐渐丰富。健康既指向生理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还指向社会适应。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身体，必然也是涵盖健康概念所指向的各个内涵的。之所以将体育的意义引向身体健康这一价值定位上，赋予身体神圣权利，完全是基于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必须构建于无数个健康的身体之上，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合格的社会建构者。身体，已被视为社会的基石，将身体权利化，就是希冀通过法的形式确保社会具有稳固的构成基础。从《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到《全民健身条例》，无不体现了身体权利的逐步明晰与强化。

3 身体演变与社会变迁

身体作为社会的基本构建单位，在其生成过程中，必然会留下深刻的社会烙印，这些烙印凸显了特定时代对于身体功能的特定预期与诉求。当然，社会结构之于身体塑造，必然还需依据身体的自然生成规律；而在这二者之间，身体还有自我选择、自我实践的空间。事实上，对于身体生成过程的解释，一直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其一为自然论。身体生成的自然论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依据，强调从生物差异的角度来看待身体发展，主张从生物的基因差异以及男女荷尔蒙的差别来解读身体的种族差异与性别差异，再从中抽象出道德内涵^[2]。显然这是一种强调身体生物性特征的学术观点，其由内向外的学术路向决定了其以个体肉体为先决条件来理解社会中身体的各种差异。其二为社会建构论^[2]。作为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人，自出生便不可自决地获得了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个人的成长历程往往无可选择地被置于一个特定的社会场域之中，社会场域之中的种种力量对于个体社会化、身体的生成必然产生影响。在特定的场域中，社

会力量总是依据社会的需求对社会个体进行塑造,个体在学习社会规范的同时也是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自我,使自身能够承担社会期望的角色,于是社会规约、权力与个体自身的欲望、需求在身体这个实在场合相遇并发生激烈的博弈。事实上,身体的生成并非完全是生物性的,也并非完全社会性的,身体必然是基于自然身体之上的社会与文化的综合建构产物。一方面,社会建构身体;另一方面,通过身体表达社会建构。没有肉体作为先决条件,以及其隐含的形体、性征、年龄等,建构论不能无中生有的构造出一个身体来;没有社会、历史、文化建构,身体无法获取内涵,无法获取意义。

在具体的身体建构过程中,有这样两种不同的逻辑路径:第一为常规性的建构逻辑。如果将人类社会的演变历程置于十分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将发现,身体的生成有其稳定的一面,这种稳定性表现为:无论何种时代、何种社会背景之下,身体总有相对规律性的生成方式,这完全是由人的类本质——身体生成的自然律所决定的,其变异性较小;另外,身体总会受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熏陶,这些价值的凝结是由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所决定的,诸如真、善、美(或是假、恶、丑)等等。第二为非常规性的建构逻辑。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有其相似性的一面,也有差异性的一面。差异性的社会历程所造就的是世界各国各异的文化体系,每一文化体系在具体的变迁过程中又由于资源禀赋、具体境遇不同,而形成迥异的变迁路径,这些因素都将在身体教化的过程中对身体施加影响,最终导致不同时代身体生成过程的差异性。因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身体建构路径、身体承担的历史使命存有明显的差异。

综观百余年来学校体育领域身体生成与演变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身体的演变始终与社会变迁紧密地勾连在一起。尽管身体教化必须依据身体的自然生成规律,但基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特殊背景,使得身体教化方面更多的考量社会结构性压力。也就是说,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社会对于身体的教化预期更多的决定了具体的身体教化实践。无论是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引入,还是后期的苏化,无不体现出国家意愿对于身体教化的强力介入。应答国家的教化意愿,必然使得身体教化偏离常规性的教化路径,最后不得已选择一条由社会要素、国家意愿所主导的非常规性的身体教化路径。尽管这一非常规的身体教化路径很可能偏离人的全面发展价值之上的身体塑造,但却是在特定环境下不得已而采用的临时性身体整合的必需手段。近代中国学校体育身体教化的演变历程,极大地

与相应的社会变迁景象相吻合。诸如军国民体育的引入基于的是民弱国衰的背景,存种救国的压力使得这一时期的体育必然以军事操练的形式出现,身体的教化以解决国难为前提;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引入虽然表现出当时社会对于体育思想的一定反思考量,但仍然切合了德日战败后的社会背景;尔后的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兴起更是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及至建国后对苏俄体育思想的搬用,表现的是共产主义激情之下的身体改造图景;直至后起的体质教育、健康教育,才逐渐将国家意志、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对身体的渗透作用弱化,逐渐转入到身体自觉的阶段。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身体最基本的价值就是体现在构成社会这一贡献上,其他涉及的所谓身体的种种工具化用途,无疑只是对身体内涵降格化的处理。显而易见的是,身体权利的突显,既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身体的工具化价值,也以其巧妙的方式表达了社会进步场景下身体的别样内涵。

参考文献:

- [1] 朱贻庭.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8-20.
- [2] 黄金麟. 历史、身体、国家[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8-16, 54.
- [3] 体育史教材编写组. 体育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7: 188-190.
- [4] 范国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演变[J]. 体育学刊, 2005, 12(1): 81-83.
- [5] 张振华. 学校体育28年改革历程的回顾与透视[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7, 33(3): 124-126.
- [6] 孙立平. 转型与断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72.
- [7]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8: 109.
- [8] 卢元镇.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386.
- [9] 张兆才. 近代以来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历史演进[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5, 31(2): 115-117.
- [10] 闫金兰. 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历程及趋势[J]. 体育学刊, 2003, 10(5): 138-140.
- [11] 伍绍祖.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9: 55-70.
- [12] 林笑峰. 健身与体育[J]. 体育学刊, 1995, 2(2): 15-20.